



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 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

谢琳, 李港, 陈丽哲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合法性不足长期以来被视作新创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国新创企业普遍面临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 如何平衡这两类主体对企业合法性的不同诉求关系到企业存续。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这一理论视角, 构建了创新搜索(包括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模型, 并考虑了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新创企业的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产生倒 U 形作用, 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有 U 形影响; 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却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作用路径, 不仅拓展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和合法性等理论关系, 还为新创企业管理创新搜索策略及跨越合法性门槛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利用性搜索; 探索性搜索; 双元合法性; 资源编排能力; 新创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4)06-0273-11

Impact of innovation search of new ventures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y

XIE Lin, LI Gang, CHEN Liz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lack of legitimacy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failure of new ventures. China's new ventures generally face the influence of both politic and market forces, so how to balance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se two types of subject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terprise is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search (including exploitative search and exploratory search)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and consid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ploitative search of new venture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while exploratory search has a U-shaped effect on it;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ie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xploitative search and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but play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xploratory search and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The study reveals the path of innovative search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search,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legitimac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new ventures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search strategies and cross the

收稿日期: 2023-1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213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2YJA630019);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LY22G020003); 浙江省一般软科学研究项目(2023C35078);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250378)

作者简介: 谢琳(2000—), 女, 江西吉安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陈丽哲, E-mail: clizhe@zstu.edu.cn

legitimacy threshold.

Key words: exploitative search; exploratory search;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y; new ventures

“双创”背景下新创企业已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也面临新进入缺陷和较高的死亡率。以往研究认为合法性缺失是导致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采取行动获得合法性关系到新创企业的存续^[1-2]。然而,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新创企业同时受到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其既需要符合政府、监管机构等的强制规范,又遭遇市场相关主体是否认可其产品和服务的合法性考验^[3]。广泛的实践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如部分大学生、海归人才等创办的企业即使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却未必能被市场认同,一些山寨模仿、P2P网贷等创业行为尽管有市场空间,但最终也会因违反监管政策而无法持续。可见,政治和市场两类“受众(audiences)”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的行为要求和判断标准存在差异^[4],如何权衡和整合政治和市场这两类主体的合法性关系成为新创企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者们围绕新创企业合法性概念进行了初步探索^[5],基于“制度观”“战略观”和“资源观”三类理论工具对合法性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制度观”强调现有制度体系如何影响公众对合法性的评判^[6],而“战略观”将合法性视为组织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可被创业者操纵的资源^[3]。“资源观”则关注如何动态性地整合组织资源进而创造价值^[7]。虽然现有研究普遍认同新创企业在多样化制度环境中会受到不同合法性的约束,它们可能存在差异甚至相互冲突^[8],但这些研究仍不足以解释新创企业二元合法性的获取机制:首先,现有学者仅关注跨国公司^[9]、商业集团^[10]等组织在空间层面的二元合法性均衡,并未解释企业同时面临外部不同“受众”的合法性评价差别和内在联系。其次,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创新搜索对新创企业获取知识和萃取外部认可有着战略意义^[11],而相关研究却忽视了企业如何借助知识搜索策略获取合法性这一关键问题。如部分文献基于关系强度^[12]、社会网络^[13]、企业联盟^[14]等视角探索了外部知识获取与新创企业合法性的关系,但倾向将网络关系的建立等同于知识获取,并没有区分企业不同类型合法性获取的机制差异。最后,以往创新搜索作用机制的研究存在“静态资源存量假设”局限,据此资源编排理论^[15-16]提出管理者应关注对资源的动态管理(构建资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

和资源转化利用)来创造价值,这有助于揭示相似知识基础的企业其合法性水平差异的“黑箱”。尽管以往有研究强调管理者对资源管理的能动性在获取合法性的战略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3],也有学者提及创新搜索获取的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依赖管理者对资源的有效编排^[17],但资源编排能力在创新搜索与二元合法性之间的影响机理尚不可知。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225家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为数据基础,探讨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二元合法性的影响,以及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旨在丰富创新搜索、二元合法性以及资源编排能力的相关研究,并为新创企业实施创新搜索活动来跨越合法性门槛提供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二元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新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认为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情境中,组织行为是由社会认同驱使的。新创企业作为市场的新进入者,面临绩效记录不全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资源持有者可能因对其不够熟悉而未赋予其合法性,为此学术界围绕新创企业合法性开展了研究^[18]。新创企业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属性,其必须向公众展示可接受的、期望的、有用的行为和产品,才能得到公众的合法性认同^[19]。关于合法性维度的划分,虽然Scott^[6]提出的合法性“三支柱”(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维度结构被创业学者广泛接受,但是这种界定并没有考虑新创企业合法性评价的“受众”多样性和逻辑差别。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评价逻辑角度探究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如Fisher等^[2]将合法性评价主体区分为包括政府及其监管和代理机构等在内的政治主体,以及涵括顾客及其他相关方的市场类主体。政治合法性以新创企业能否带来政治利益或公共利益为判断准则,强调企业遵守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制定的相关法律、规章和标准,满足政府等机构对企业的特定要求并获得其认可^[8]。而市场合法性以新创企业的经营成功与否加以评判,注重企业利用市场上各方共享的行为规范,通过主动行动获得市场参与者(如供应

商、顾客等)的认可和支^[20]。鉴于政治和市场两类合法性存在的差异和冲突^[4],并对企业从不同角度产生影响,企业在战略选择时通常会面临市场效率和制度期望的权衡难题,于是诱发了“二元合法性”现象。本文借鉴组织二元理论,将新创企业二元合法性定义为通过权衡和整合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帮助新创企业实现规避管制风险和获得市场持续认可的均衡。参考Cao等^[21]研究,将二元合法性分为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两个维度。其中,二元合法性均衡是指新创企业运用协调机制,维持政治和市场合法性的均衡发展,缩小两类合法性在特定时点上的差距来维持二元平衡状态,而二元合法性组合则强调两类合法性整合,发挥政治和市场合法性的协同效应。

(二)资源编排能力

新创企业创立过程不仅依赖外部相关方支持,还通过资源配置调度创造价值^[20]。资源观虽然强调占用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形成能力的基础,却忽略了通过对资源有效管理来促进资源—能力—价值创造之间转化^[22],并不能揭示动态环境下资源禀赋相似的企业能力或绩效的差异。转型经济情境下,新创企业急需拓展和积累资源,并且其自身缺少构建、捆绑和利用资源重构价值创造体系流程的能力^[22],因此企业需要在外部环境获取整合资源,形成自身核心能力。基于此,Sirmon等^[16]提出资源编排理论,基于过程视角探索资源与能力之间的黑箱,回答动态环境下企业管理者如何通过主动的资源管理过程实现与环境匹配。具体而言,管理者对资源的编排能力包括三个既相互联系又互补的过程:一是构建资源组合,通过资源获取、内部积累以及剥离所控制的资源等方式实现关键资源的结构化,进而达到与外部环境匹配的目的;二是资源归拢整合,借助资源的渐进式改进、丰富化和资源开拓形成核心能力;三是资源转化利用,通过资源的调动、协调和重置来利用市场机会并创造价值^[16,23]。虽然以往关于吸收能力、知识整合的研究也涉及企业对外部分散、无序的知识和资源的吸收、整合和利用能力,但这些研究更强调企业对外部获取知识利用转化的客观水平或静态能力。然而,基于资源行动视角,更高的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比来自更有效的资源编排行动^[24],这启发本文挖掘管理者在资源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动态作用。

(三)创新搜索与二元合法性

创新搜索是演化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多个学科

交叉的概念,指企业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扫描或探测信息、知识和解决方案的一系列活^[11]。企业通过创新搜索与外部知识源建立合作关系搜寻市场偏好、新技术等信息,为其获得合法性奠定知识基础^[25]。国内外研究虽然已划分了多种创新搜索维度,但不同学者即使在同一维度模式(如宽度和深度)下对创新搜索作用的实证结论仍然存在分歧^[26]。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可能与以往研究过于强调从不同视角界定创新搜索概念和维度有关,而忽视了创新搜索本质上是一种学习方式,涉及企业现有知识的利用和外部新知识的探索^[27]。新创企业获取外部二元合法性,既要通过学习获取外部知识和资源满足潜在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又要在不断解决当前的产品^[28]和市场问题过程中,确保企业的经营符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8]。考虑到组织学习的二元性,本文参考March^[28]相关研究,从学习方式角度将创新搜索划分为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其中,利用性搜索被界定为新创企业搜索现有的或可获取的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在熟悉的领域中开展活动;探索性搜索是指新创企业通过搜索以往不熟悉的新知识,以改变现有的组织惯例或知识基础。

新创企业缺乏历史绩效和证据来合法化其创新活动^[3],而利用性搜索强调在熟悉领域搜寻知识和创新方案带来稳定的收益回报,这会帮助“受众”合理判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市场互动等搜索方式进入成熟的行业或市场环境^[14],在这种环境中由于技术和产品被公众所熟知,因而容易被市场相关方接受。为此,新创企业按照公众的绩效或行为期望标准开展利用性搜索活动^[2],借助成熟知识完善现有产品、服务和流程,并能利用“合法性溢出”效应成功跨越新市场门槛^[5]。另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利用性搜索在深度挖掘现有技术和业务领域、持续解决当前产品^[2]和市场问题的同时,在制度同构作用下学习行业标杆的操作标准和流程,确保企业的运营模式符合政府的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并缓解其在现行监管制度结构下可能引发的合法性冲突^[19]。然而,利用性搜索过度也会造成创新合法性获取“短视”^[29],从而阻碍新创企业二元合法性。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可知,利用性搜索过度强调相似知识会阻碍企业获取多样化资源,使企业逐渐丧失对环境判断的敏感性^[30]。这可能阻碍企业创新性产品的上市,诱发主导市场萎缩或业绩波动,遭致市场相关主体对其合法性的质

疑^[31]。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新创企业对现有搜索路径和方式的过度依赖,不仅可能错失行业新技术迭代的机会窗口,还会偏离政府的产业规划、创业政策等引导方向,进而丧失政府、评审机构等相关方的推介和支持^[12]。并且,由于新创企业利用性搜索过度引发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与地方官员注重短期政绩回报的预期不匹配,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创业活动的制度性资源配置^[4]。进一步而言,新创企业的创业活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产业管制、行业标准等带来了冲击^[18],利用性搜索过度引发的创新锁定必然导致企业陷入制度上“求同”还是市场上“存异”的选择困境^[20,29]。在认知惯性作用下,管理者倾向某个时点选择单一主导合法性来应对合法性二元权衡问题^[18],最终加剧企业市场和政治两类合法性认同的失衡。尤其在资源约束下,许多新创企业倾向通过遵循政府政策、行业规范等保守方式来提升政治合法性,而获得市场合法性的产品创新等活动得不到资源支持甚至受到政府政策干预,进而无法更好地发挥政治和市场两类合法性的协同作用^[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利用性搜索对二元合法性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

探索性搜索通常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和制度为新创企业带来全新的产品架构或商业模式,这可能在技术范式、消费偏好等方面与利益相关者产生价值冲突^[32],并引发公众在现有知识框架下对新事物的认知障碍。由于新创企业在市场和技术上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实施探索性搜索的企业注重获取独特性技术或稀缺性机会,在亲创新(pro-innovation)导向作用下可能忽视当前市场上客户、供应商等的真实需求,进而导致企业开发出的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被相关方接受^[2]。尽管新创企业通过探索性搜索可能超越在位者,但行业技术或产业制度化等因素会对其产生合法性约束^[33]:一方面,出于对新技术的不确定性认知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在位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管制政策等方式对新创企业加以排斥^[34];另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创新进入新行业,在初期面临行业质量标准、产品标准等制度约束,激进地探索性搜索可能导致其难以确定消费者和合作者的偏好。然而,随着新创企业对外部环境的熟悉和搜索经验的积累,利用外部知识和机会将细分市场的成功产品逐步扩散至主流市场,由此会引发新的产业规则和产品标准的革新^[31]。新创企业通过对外部新颖知识的探索来降低不确定性,逐渐在突破

旧制度束缚与获取组织合法性需求之间寻求平衡^[3],伴随新产品或新技术被相关方逐渐接受,其二元合法性也得到提升。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对市场需求的主动搜索,能够获取领先用户对创新产品的试用反馈和提炼独特的销售主张^[27],并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满足主流顾客需求来获得市场相关方的信任与支持^[7]。在合法化策略方面,企业通过在探索性搜索中与外部关键主体建立网络联结关系,积极发展新的商业理念和业务运作模式,借助网络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声誉“骑背效应”,主动塑造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性的潜在感知^[14]。另一方面,持续探索政府政策、制度环境等知识,有利于新创企业与政府等构建良好的关系并降低政策壁垒,向社会传递出企业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等信号^[13]。这使供应商、消费者等相关方相信企业拥有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从而促进创新市场化的良性发展^[2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探索性搜索对二元合法性有U形影响。

(四)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环境下,新创企业对外部不同知识源进行识别和获取增加了协调的难度和成本,知识差异性和复杂性有赖于管理者对其更好地结构化、归拢和转化利用^[35]。管理者通过对外部搜索的知识资源在内部动态整合与配置,重新建立知识资源之间的内在结构和更好地挖掘潜在知识组合的价值^[17]。同时,新创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必须编排资源组合和建立资源库来缓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行为为企业获得合法性创造了绩效追踪记录^[36]。根据Sirmon等^[16]的资源编排三部曲可知,新创企业资源编排能力在外部知识获取和响应不同制度压力之间发挥着转换器作用^[35]。一方面,新创企业创新搜索通过知识积累、资源剥离等动态编排方式,将有用知识进行结构化,从资源的归拢过程中利用市场机会为顾客持续创造价值^[34],从而更容易获得市场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管理者发挥内部资源编排能力,通过资源的稳定化、丰富化和资源开拓提升创新搜索到的新颖知识在企业内部的转化利用效率,并利用资源的调度、重组等方式克服资源稀缺对创业活动的制度性制约^[37]。尤其新创企业通过资源编排将部分资源配置在行业许可、项目审批、产品认证等制度认可性活动中,这有利于其与政府机构、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建立良好关系^[32],极大提高了企业新产品或新技术获得政府等机构接受和认

可的合法性。

此外,新创企业采取利用性搜索专注萃取熟悉和精准的知识^[28],通过经验积累和对知识的编码、吸收不断改良组织内部的资源管理惯例^[27],能够明确资源编排行动的方向性和目标性;探索性搜索强调对现有知识基的替代式重构^[37],有助于提升新创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整合、转化资源的柔性^[18]。同时,新创企业发挥资源编排能力能够将多元化知识归类且结构化,有利于管理者随时调动市场类和政策类相应的知识用于产品营销、品牌管理等,以此争取到顾客、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认可。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二元合法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资源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二元合法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U”“∩”分别表示正向、U 形、倒 U 形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搜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样本数据,调研对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四个省市的新创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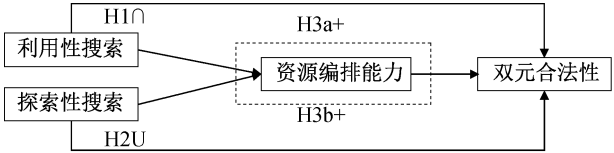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

及其创业者。新创企业在创立过程中,先后会经历初创期和青春期两个阶段,根据何霞等^[14]的界定,本文选择成立 8 年及以内的企业及其创业者作为主要调研对象。

为了保证问卷内容的清晰程度和可理解程度,在问卷发放之前邀请了浙江某高校符合要求的 30 位 MBA 学员做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题项进行了多次研讨,形成最终问卷。通过现场调研、利用个人和团队的社会关系等途径共计发放问卷 600 份(每家企业 1 份),累计回收 308 份(回收率 51.33%)。剔除回答缺漏或未填完、操控性检验题项存在矛盾、规律性强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225 份(占回收问卷总量的 73.05%),问卷填写质量较好。为了检验调查结果是否存在回答者偏误,课题组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特征变量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途径的调查结果可以合并使用。样本企业和被调查者的主要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特征统计表(N=225)

项目	企业特征	企业数	百分比/%	项目	企业特征	企业数	百分比/%
企业规模	少于 300 人	101	44.89	行业类型	物联网及服务器	24	10.67
	300~500 人	76	33.78		软件及电子商务	49	21.78
	501~1000 人	36	16.00		节能环保	30	13.33
	大于 1000 人	12	5.33		生物医药	25	11.11
企业年龄	少于 3 年	47	20.89		新材料	29	12.89
	3~5 年	110	48.89		高端装备	22	9.78
	6~8 年	68	30.22		新能源及节能	18	8.00
企业研发投入	小于 2%	36	16.00		其他行业	28	12.44
	2%~3%	82	36.44	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	专科及以下	39	17.33
	大于 3%	107	47.56		本科	143	63.56
被调查者年龄	30 岁以下	31	13.78		研究生及以上	43	19.11
	31~40 岁	100	44.44	被调查者性别	男性	162	72.00
	41~50 岁	52	23.11		女性	63	28.00
	50 岁以上	42	18.67				

(二)变量测量

本文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设计完善了测量工具,问卷预测试信效度良好。本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打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

a)二元合法性。参考郭海等^[4]、Suchman^[7]研究,用本文的做法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等

4 个指标测量政治合法性,用本文的做法获得了“顾客的认可”等 4 个题项测量市场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参考郑小勇等^[10]、Cao 等^[21]研究对二元合法性的测量方式,采用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的绝对值差来衡量二元合法性均衡,为了便于观测用(5-|政治合法性-市场合法性|)表示二元合法性均衡

水平大小,采用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的乘积来表示二元合法性组合。

b)创新搜索。本文借鉴了吴松强等^[27]等相关研究,用“企业重视从外部知识源搜寻和获取熟悉领域的知识”等 3 个题项测量利用性搜索,用“重视从外部知识源中搜索和获取前瞻性知识相关进展”等 3 个题项测量探索性搜索。

c)资源编排能力。借鉴 Sirmon 等^[23]、Wang 等^[17]等研究,围绕资源编排能力的构建资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和资源转化利用三个过程,用“企业能够获取各类资源”等 9 个题项测量资源编排能力。

d)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12],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研发投入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样本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来测量,因为此数值能粗略地表征企业目前所拥有的资源;企业年龄以经营年限来衡量;研发投入用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取自然对数测量;行业类型用虚拟变量表示物联网及服务器、软件及电子商务、节能环保

等其他行业,其中(1,0,0)代表物联网及服务器,(0,1,0)表示软件及电子商务,(0,0,1)表示节能环保行业,(0,0,0)表示其他行业,在数据分析时,取其他行业作为哑变量。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借助 Cronbach's α 系数衡量各个变量的测量信度,采用 SPSS22.0 软件分析整理得到如表 2 所示的结果,其中所有测量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7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因子分析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均处于可接受范围,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2)显示 23 个题项共提取出 5 个因子,各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 1,各因子载荷均接近或大于 0.7,这说明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各变量的 AVE 和 CR 值也分别满足高于 0.5 和 0.8 的要求,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 2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载荷范围	解释变异量	Cronbach's α	KMO 值	AVE	CR
利用性搜索	3	0.823~0.877	37.104%	0.877	0.835	0.652	0.882
探索性搜索	3	0.815~0.880	36.802%	0.783	0.803	0.648	0.880
资源编排能力	9	0.798~0.858	77.696%	0.941	0.860	0.605	0.821
政治合法性	4	0.781~0.894	36.721%	0.868	0.817	0.593	0.852
市场合法性	4	0.827~0.868	34.525%	0.853	0.837	0.645	0.879

为了进一步验证关键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借助 AMOS22.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如表 3 所示。与其他四组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

的拟合效果更好,表明创新搜索、合法性和资源编排能力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GFI	TLI	CFI	RMSEA
单因子模型	14.203	0.524	0.316	0.392	0.165
双因子模型	11.063	0.576	0.479	0.540	0.128
三因子模型	10.432	0.608	0.512	0.574	0.097
四因子模型	6.236	0.734	0.729	0.769	0.086
五因子模型	1.544	0.941	0.972	0.977	0.045

表 4 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主要变量 AVE 的平方根,数据显示,利用性搜索与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显著正相关,探索性搜索与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利用性/探索性搜索对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的作用得到初步显示,下文借助回归分析来验证假设。

(二)假设检验

本文借助多元层级回归方法检验假设,为降低

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首先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因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所有方程的 VIF(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 5。为了克服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将对关键变量有影响的因素纳入控制变量加以考虑,在构建理论模型时遵循资源编排理论逻辑避免变量间双向影响。表 5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是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 3—模型 8 分别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企业规模											
2. 企业年龄	0.119 *										
3. 研发投入	0.029	0.019									
4. 物联网及服务器行业	-0.041	-0.009	-0.016								
5. 软件及电子商务行业	-0.049	-0.028	0.054	-0.262 **							
6. 节能环保行业	0.064	-0.064	-0.047	0.436 **	-0.525 **						
7. 利用性搜索	-0.002	0.077	0.152 *	0.039	0.049	-0.024	(0.807)				
8. 探索性搜索	0.051	0.077	0.015	-0.003	-0.027	-0.017	0.240 **	(0.805)			
9. 资源编排能力	0.148 *	0.112 *	0.097	-0.001	-0.064	0.011	0.480 **	0.476 **	(0.778)		
10. 政治合法性	0.124 *	0.153 **	0.070	0.029	0.056	-0.082	0.202 **	0.131 **	0.282 **	(0.770)	
11. 市场合法性	0.067	0.064	0.134 *	0.040	-0.030	-0.032	0.270 **	0.120 **	0.266 **	0.257 **	(0.803)
均值	6.053	2.363	4.773	0.179	0.239	0.467	3.617	3.720	3.814	3.602	3.548
标准差	0.904	1.240	0.821	0.384	0.427	0.500	0.970	0.869	0.733	0.935	0.941

注: $N=225$; * $P<0.05$, ** $P<0.01$, *** $P<0.001$ (双侧检验),下同。企业规模、研发投入控制变量已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 AVE 的平方根。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编排能力		二元合法性均衡			二元合法性组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企业规模	0.132 *	0.121 **	0.040	0.050	0.024	0.110 *	0.114 *	0.082
	(2.461)	(2.823)	(0.747)	(1.045)	(0.512)	(2.060)	(2.305)	(1.685)
企业年龄	0.087	0.028	0.090	0.034	0.028	0.123 *	0.074	0.067
	(1.604)	(0.630)	(1.656)	(0.705)	(0.595)	(2.286)	(1.467)	(1.357)
研发投入	0.094	0.030	0.143 **	0.085	0.079	0.132 *	0.085	0.077
	(1.761)	(0.690)	(2.676)	(1.773)	(1.668)	(2.503)	(1.710)	(1.591)
物联网及服务器行业	-0.051	-0.081	-0.064	-0.089	-0.072	0.023	-0.003	0.019
	(-0.662)	(-1.294)	(-0.827)	(-1.277)	(-1.046)	(0.294)	(-0.038)	(0.263)
软件及电子商务行业	-0.108	-0.131 *	-0.029	-0.046	-0.019	-0.014	-0.028	0.006
	(-1.324)	(-1.981)	(-0.349)	(-0.628)	(-0.255)	(-0.168)	(-0.368)	(0.084)
节能环保行业	-0.067	-0.081	-0.104	-0.108	-0.091	-0.063	-0.069	-0.047
	(-0.760)	(-1.146)	(-1.182)	(-1.371)	(-1.170)	(-0.725)	(-0.837)	(-0.590)
利用性搜索		0.394 ***		0.247 ***	0.164 **		0.225 ***	0.121 *
		(8.135)		(4.581)	(2.823)		(4.013)	(2.026)
探索性搜索		0.372 ***		0.131 *	0.052		0.146 **	0.048
		(7.999)		(2.525)	(0.938)		(2.718)	(0.843)
利用性搜索 ²		0.004		-0.252 ***	-0.253 ***		-0.141 **	-0.142 **
		(0.096)		(-4.903)	(-5.005)		(-2.640)	(-2.729)
探索性搜索 ²		0.016		0.177 ***	0.174 ***		0.165 **	0.161 **
		(0.346)		(3.551)	(3.544)		(3.185)	(3.184)
资源编排能力					0.211 ***			0.263 ***
					(3.539)			(4.278)
R^2	0.045	0.396	0.040	0.252	0.279	0.055	0.193	0.235
调整 R^2	0.028	0.378	0.023	0.230	0.255	0.038	0.169	0.210
F 值	2.642	21.998	2.362	11.320	11.782	3.306	8.028	9.337

注:括号内为 t 值。

从表 5 的模型 4 和模型 7 可知,利用性搜索对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一次项分别为正且显著,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利用性搜索对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均有倒 U 形作用。由于学术界有研究质疑回归方程中的二次项系数显著并不是曲线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33],本文借鉴 Haans 等^[38]对

变量间倒 U 型关系的三步检验程序,借助 Stata 软件进一步分析,即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平方项回归系数是否为负且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取最小和最大值时的曲线斜率是否分别为正和负,第三步观察曲线拐点是否在标准化处理后的自变量取值范围之内。结果显示:其一,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二次项显著且为负($\beta_1 = -0.252, P < 0.001$)。在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的回归模型中,最低处和最高处时的曲线斜率分别为 0.417 和 -0.063 且显著,满足 Slope 值一正一负检验要求,且利用性搜索的拐点值为 4.573 落在[1, 5]的取值区间;其二,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组合二次项显著且为负($\beta_2 = -0.141, P < 0.01$)。在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组合的回归模型中,最低处和最高处时的曲线斜率分别为 0.745 和 -0.226 且显著,满足 Slope 值一正一负的检验要求,且利用性搜索的拐点值为 4.242 也在[1, 5]范围内。综上,假设 H1 得到支持。

同理,表 5 中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的一次项与平方项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其对双元合法性组合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也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起到了 U 形影响。借鉴 Haans 等^[38]对变量间 U 型关系的三步检验程序发现,在探索性搜索取值区间下限附近,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均衡关系的系数为负($\beta = -0.465$),在取值上限附近,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均衡关系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487$),且计算出 U 型曲线的拐点在探索性搜索 Likert5 级量表评分为 3.207。同理,探索性搜索平方项对双元合法性组合显著正向($\beta_2 = 0.165, P < 0.01$),最低处和最高处时的曲线斜率分别为 0.567 和 -0.639,满足 Slope 值一正一负检验要求,且曲线拐点值为 3.355 落在[1, 5]的取值区间,因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

遵循 Baron 等^[39]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首先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显著影响已在主效应中得到验证。然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从表 5 的模型 1 和模型 2 可知,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资源编排能力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资源编排能力有积极影响;而两者的平方项对资源编排能力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本文不需要考虑资源编排能力对创新搜索与合法性二元之间的非线性中介。最后,在表 5 的模型 5 和模型 8 中同时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发现利用性搜索对双

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影响分别减少且显著,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影响却分别减少到不显著,这说明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假设 H3a 得到验证;资源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即假设 H3b 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真实可靠,参考侯珂等^[40]采用的稳健性检验方式,借助 Bootstrap 方法对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以及双元合法性组合的直接效应分别为 0.195 和 1.020,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05, 0.284]和[0.395, 1.645],间接效应分别为 0.069 和 0.684,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28, 0.110]和[0.370, 0.999],上述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3a 得到进一步验证。另外,在资源编排能力的作用下,探索性搜索会影响双元合法性均衡以及双元合法性组合,总效应显著(效应值分别为 0.107 和 0.918,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引入资源编排能力后,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126 和 1.004),再次证实资源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3b 得到进一步验证。

四、结 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模型,探讨了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本文从政治和市场双元合法性视角发现,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新创企业双元合法性分别有倒 U 形和 U 形影响。第二,由于新创企业的不同搜索策略对资源编排能力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资源编排能力在创新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着不同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但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a)从“受众”角度区分新创企业双元合法性。本文将双元合法性视为“被动的外部相关方感知”和“管理者主动可操纵的资源”的统一体,并从转型经济情境下的政

表 6 Bootstrap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	效应值	Bootstrap 标准误	t	95%置信区间(5000 样本)	
					下限	上限
利用性搜索→二元合法性均衡	总效应	0.263	0.040	6.65***	0.186	0.341
	直接效应	0.195	0.046	4.27***	0.105	0.284
利用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二元合法性均衡	间接效应	0.069	0.021	3.28***	0.028	0.110
利用性搜索→二元合法性组合	总效应	1.704	0.276	6.18***	1.163	2.245
	直接效应	1.020	0.319	3.20***	0.395	1.645
利用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二元合法性组合	间接效应	0.684	0.160	4.27***	0.370	0.999
探索性搜索→二元合法性均衡	总效应	0.107	0.040	2.69**	0.029	0.186
	直接效应	−0.019	0.041	−0.46	−0.099	0.061
探索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二元合法性均衡	间接效应	0.126	0.024	5.24***	0.079	0.174
探索性搜索→二元合法性组合	总效应	0.918	0.337	2.72**	0.257	1.579
	直接效应	−0.086	0.362	−0.24	−0.795	0.622
探索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二元合法性组合	间接效应	1.004	0.178	5.63***	0.655	1.354

治和市场双重合法性嵌入实际出发,借助组织二元性相关理论界定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两个维度;b)从“资源观”视角出发,探究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二元合法性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实证发现,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二元合法性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这不仅将合法性的前置因素从制度因素、网络嵌入、战略联盟等因素拓展到创新搜索领域,而且较好地阐述了在中国当前转型经济时期,新创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知识来平衡获取政治和市场合法性,并厘清了创新搜索与二元合法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c)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揭示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二元合法性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基于 Sirmon 等^[23]研究建构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能力—二元合法性”的理论逻辑,检验了资源编排能力对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与二元合法性关系的差异化作用路径,使得创新搜索与合法性两个研究领域通过资源编排能力得以较好衔接,并拓展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和合法性等理论的解释边界。

(三)管理启示

本文的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a)新创企业应当站在“受众”的立场来看待合法性问题。转型经济情境下,我国新创企业管理者应高度重视政治和市场这两大类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并采取针对性的合法性方式满足多方需求和化解合法性冲突;b)新创企业需要权衡采取不同的创新搜索策略来跨越“合法性门槛”。在创立初期,新创企业应该借助利用性搜索策略获取外部熟悉知识或创新方案,推出满足当前市场和顾客需求的产品来获得市场合法性,并遵守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来获得现行监管体制下的政治合法性,从

而促进新创企业有效协调和整合政治与市场这两类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在积累搜索经验和熟悉市场环境之后,企业应该采取探索性搜索将细分市场的成功逐步扩散到主流市场,利用新的产业规则和产品标准革新活动增强市场主体对企业的合法性感知,并通过与政府、监管部门等机构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来触动政府调整对新兴行业领域的监管政策;c)重视管理者对资源管理的能动作用来获取合法性。为了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搜索获得知识,新创企业需要充分发挥管理者对知识资源的构建、归拢和转化利用的作用,以更好地获取政治和市场二元合法性。对新创企业而言,管理者在利用性搜索过程中应该注重培育构建资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等能力,以直接或间接促进新创企业获取外部“受众”的认可和支持,而在探索性搜索活动中,重点借助理管理者的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能力来纾解合法性不足的困境。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文试图通过构建“创新搜索—资源编排—二元合法性”理论模型回答“新创企业如何同时满足政治和市场两类受众诉求”这一问题,但现象驱动导致的双元合法性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仍有待进一步细化,未来可以通过扎根理论厘清该变量的各个子维度。此外,本文仅从内部资源视角探讨知识获取对企业合法性跨越的作用机制,但在数字智能时代,企业知识搜索活动受到管理者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分析管理认知因素如何影响创新搜索与二元合法性的关系,并探讨管理者对外部环境信息分离和归类的具体策略。

参考文献:

- [1] 张燕, 周小虎, 张慧, 等. 象征性行动的量表开发及其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的影响: 环境宽松性的调节作用[J]. 系统管理学报, 2023, 32(1): 154-166.
- [2] Fisher G, Kuratko D F, Bloodgood J M, et al. Legitimate to whom? The challenge of audience diversity and new venture legitimac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1): 52-71.
- [3] Zimmerman M A, Zeitz G J.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3): 414-431.
- [4] 郭海, 沈睿, 王栋哈, 等. 组织合法性对企业成长的“双刃剑”效应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5): 16-29.
- [5] 葛建华, 汪振涛, 雷玮. 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动向与路径演变[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2, 34(2): 117-133.
- [6]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53.
- [7]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 [8] Fisher G. The complexities of new venture legitimacy [J]. Organization Theory, 2020, 1(2): 1-25.
- [9] Zhong S, Zhao X, Song J. MNEs' ambidexterity strategies and moral conflicts: The case of Google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3, 186: 781-796.
- [10] 郑小勇, 魏江. 商业集团从属企业双重合法性与成长绩效的关联机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6, 30(2): 9-19.
- [11] Hu P, Wang Y, Feng T, et al. Innovative search,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21, 15(5): 961-984.
- [12] 王玲玲, 赵文红, 魏泽龙. 创业制度环境、网络关系强度对新企业组织合法性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17, 14(9): 1324-1331.
- [13] 宋晶, 陈劲. 创业者社会网络、组织合法性与创业企业资源拼凑[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1): 86-94.
- [14] 何霞, 苏晓华. 环境动态性下新创企业战略联盟与组织合法性研究: 基于组织学习视角[J]. 科研管理, 2016, 37(2): 90-97.
- [15] 杨亚倩, 蔡莉, 詹天悦, 等. 机会集视角下数字平台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研究[J/OL]. 科学学研究, 2023[2023-10-26].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31026.004>.
- [16]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1390-1412.
- [17] Wang J, Xue Y, Yang J.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firms' green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y[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0, 29(2): 361-374.
- [18] Guo H, Shen R, Su Z.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on product innov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new ventures and established firm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9, 66(1): 73-83.
- [19] 项国鹏, 万时宜, 黄大明. 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的跨越机制: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案例研究[J]. 南方经济, 2020(12): 108-125.
- [20] 郭海, 李阳, 李永慧. 最优区分视角下创新战略和政治战略对数字化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1, 33(1): 12-26.
- [21] Cao Q, Gedajlovic E, Zhang H. 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 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4): 781-796.
- [22] 奉小斌, 苏佳涵, 彭学兵. 跨界搜索对商业模式二元的影响: 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6(4): 376-387.
- [23]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1): 273-292.
- [24] 杨苗苗, 王娟茹. 跨界搜索、知识整合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4): 696-704.
- [25] 奉小斌, 周兰, 马晓书, 等. 创新搜索与决策理性的匹配对组织二元性的影响: 基于逆向国际化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0, 13(4): 414-430.
- [26]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 131-150.
- [27] 吴松强, 蔡婷婷, 赵顺龙.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搜索与企业竞争优势[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7): 1196-1205.
- [28]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1): 71-87.
- [29] Zhao E Y, Fisher G, Lounsbury M, et al.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Broaden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1): 93-113.
- [30] Kobarg S, Stumpf-wollersheim J, Welpel I M. More is not always better: Effects of collaboration breadth and depth

on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project level[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1): 1-10.

[31] 郁培丽, 刘沐洋, 潘培尧.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 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41(3): 111-125.

[32] 李雪灵, 马文杰, 刘钊, 等. 合法性视角下的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 基于中国新企业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8): 99-108.

[33] 杜运周, 张玉利, 任兵. 展现还是隐藏竞争优势: 新企业竞争者导向与绩效 U 型关系及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J]. *管理世界*, 2012(7): 96-107.

[34] Shi X, Zhang Q, Zheng Z.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external search in collaboration networks: Embeddedness in knowledge networks as moderators [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9, 23(10): 2135-2160.

[35] Sheng M L. A dynamic capabilities-based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through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towards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product innovation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7, 65: 28-38.

[36] 奉小斌, 马晓书. 决策理性视角下知识搜索对创新合法性的影响[J]. *科研管理*, 2022, 43(10): 172-179.

[37] Baert C, Meuleman M, Debruyne M, et al. Portfolio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Portfolio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6, 10(4): 346-370.

[38] Haans R F J, Pieters C, He Z L.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 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7): 1177-1195.

[39]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40] 侯珂, 李鑫浩, 阮添舜. 创新生态系统不确定性条件下后发企业何以实现颠覆性创新: 基于 SOR 模型的动态能力中介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8): 44-54.

(责任编辑:雷彩虹)